



新结构经济学丛书

智库·报告·致用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林毅夫 付才辉 陈 曦◎主编

中国经济的  
转型升级

新结构经济学方法与应用

非外借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新结构经济学丛书**  
智库·报告·致用



林毅夫 付才辉 陈曦◎主编

·  
·  
·

# 中国经济的 转型升级

新结构经济学方法与应用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新结构经济学方法与应用/林毅夫,付才辉,陈曦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0

(新结构经济学丛书)

ISBN 978-7-301-29941-8

I. ①中… II. ①林… ②付… ③陈… III. ①结构经济学—案例 IV. ①F01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29123 号

- 书 名** 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新结构经济学方法与应用  
ZHONGGUO JINGJI DE ZHUANXING SHENGJI
- 著作责任者** 林毅夫 付才辉 陈 曦 主编
- 责任编辑** 任雪莹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9941-8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 电子信箱** [em@pup.cn](mailto:em@pup.cn) QQ:552063295
- 微信公众号** 北京大学经管书苑(pupembook)
- 电 话**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52926
-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5.75 印张 327 千字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49.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 作者简介

(按本书文章排序)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

付才辉,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研究员

申广军,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

王丽莉,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一,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助理副行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访问教授

吴垠,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系主任

阮建青,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

石琦,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张晓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胡晨光,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教授

程惠芳,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教授,全球浙商发展研究院院长

俞斌,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副教授,全球浙商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姚耀军,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郑涛,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系主任

左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韩楠,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罗仲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与创新创业研究室研究员、主任

黄阳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目 录

Contents

导 论	001
-----	-----

## 方 法 篇

### 第一章

产业政策与我国经济的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林毅夫	009
------------------------	-----	-----

### 第二章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及其在转型升级中的应用	付才辉	016
---------------------	-----	-----

### 第三章

地区比较优势与企业选址:新结构经济学的微观应用	申广军	036
-------------------------	-----	-----

## 应 用 篇

### 第四章

中国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基于工业化路径的跨国比较	王丽莉	文 一	047
---------------------------	-----	-----	-----

### 第五章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方式与政策设计:基于新、 旧结构经济学对比的视角	吴 垠	101
---------------------------------------	-----	-----

## 第六章

产业集群动态演化规律与地方政府政策 阮建青 石琦 张晓波 125

## 第七章

“有为政府”与集聚经济圈的演进：一个基于长三角集聚

经济圈的框架 胡晨光 程惠芳 俞斌 147

## 第八章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观浙江经济转型升级：从“斯密型”

增长到“熊彼特型”增长的过渡 姚耀军 163

## 第九章

制造业选择、比较优势与河北省产业结构升级

郑涛 左健 韩楠 174

## 第十章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融资研究：

最优金融结构的视角 罗仲伟 黄阳华 183

## 第十一章

比较优势与僵尸企业：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研究 申广军 202

## 第十二章

吉林振兴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思路、工具方法与

政策方案 林毅夫 付才辉 225

## 导 论

近年来,林毅夫教授不但积极倡导新结构经济学的新理论,还力行“知成一体”的新学风。<sup>①</sup>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秉承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作为人生信条。然而,这只是在道德哲学范畴中,比如你要孝顺父母,你要友爱兄弟,你知道应该这样做,你做了,你就成了。所以,王阳明讲“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林毅夫教授却认为在现代社会科学里,仅有“知行合一”还不够。比如,许多经济问题,好像按照流行的理论也可以讲清楚。然而事实是,按照这些流行观点做,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变得更糟、更复杂。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探究“知”的问题,还要最终以“成”来检验这个“知”,社会科学家的责任是“唯成乃真知”。因此,在王阳明的基础上,林毅夫教授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哲学是“知成一体”,其内涵包括:“因行获知”,任何理论都是来自于现象,现象是行动的结果,因为有这些“行”,可以得到“知”;“用知践行”,知识分子获得知识的目的是要在实践上指导行为;但是“行”本身不是目的,“成”才是目的,所以要“以成证知”,按照这个理论指导去做能成功,才证明你的认识是对的,最后才能“知成一体”。新结构经济学虽然是一个初生的学派,但正在“知成一体”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

林毅夫教授也身体力行“知成一体”的学风,不遗余力地将新结构经济学转化为实践,在实践中完善新结构经济学,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中国经济学界来说,2008年林毅夫教授成为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因为这一职位被认为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的最高职位,历来由发达国家的大师级经济学家担任。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林毅夫教授充分利用该平台积极推动新结构

---

\* 关于近年来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研究进展的详细综述可参见:付才辉.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研究进展:工具与案例[J].制度经济学研究,2017,4.

① “新结构经济学”(New Structural Economics)一词由林毅夫教授提出和倡导,2009年6月林毅夫在其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的内部研讨会上,以他与蔡昉和李周于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和2007年的马歇尔讲座的理论框架为基础,反思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经济学成为一门学科以来的理论进展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与转型的成败经验,指出第一版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重视政府而忽视市场作用,以及第二版的“新自由主义”发展经济学重视市场而忽视政府作用的偏颇,提出以“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版。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个作为经济基础的产业、技术不断升级,和作为上层建筑的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过程,并以此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强调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有效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也需要“有为的政府”来克服结构变迁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市场失灵,弥补市场发育不足的缺陷,主张“市场的有效以政府的有为为前提,政府的有为以市场的有效为依归”。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详细综述可参考:付才辉.创建我国自主创新的新结构经济学学科:综述、架构与展望[J].制度经济学研究,2015,4.

经济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实践,以帮助世界银行实现其“没有贫困的世界”这一使命,推动了世界银行这个重要的多边发展机构反思自身的发展思想与政策导向。例如,在林毅夫教授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之前,基础设施和产业政策在世界银行都是新自由主义发展思潮笼罩下的禁区。就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伊始,刚刚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教授根据新结构经济学对全球金融危机根源与世界发展本质进行深入分析后,提出了一套超越凯恩斯主义兼顾短期反周期与长期发展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方案,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至今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已经接受了此方案,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为抓手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已经得到半个地球的响应。这些新思想、新方案被总结在林毅夫教授的《从西潮到东风》一书中,标志着全球发展思潮已经开始向东转移。<sup>①</sup> 林毅夫教授和王燕教授在《超越发展援助》一书中提出了可操作性很强的建议,即利用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上的比较优势来帮助非洲及“一带一路”沿线等发展中经济体发展,重塑南南合作新模式。<sup>②</sup> 林毅夫教授与非洲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孟加合著的《战胜命运》一书也为非洲等发展中经济体“战胜命运”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sup>③</sup> 林毅夫教授和付才辉还发布了新结构经济学关于世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智库旗舰报告。<sup>④</sup> 基于这些源自理论创新的新理念,林毅夫教授不但担任了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首任院长,在三尺讲台上培养发展中国家的人才,而且不辞辛劳深入世界各国的发展政策实践第一线为各国领导人出谋划策。目前,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思想、理论及政策工具已经被广泛应用到我国各地区、非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发展与转型经济体之中。例如,在国内,林毅夫教授出任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副主席,新结构经济学也得到河北、西藏、吉林、广东、新疆、山西、浙江等地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政策实践的借鉴应用。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林毅夫教授也推动在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和吉布提等非洲国家设立工业园克服基础设施的瓶颈,用一站式服务改善营商环境,通过招商引资来发展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些试点政策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改变了过去世人认为非洲那些落后的,尤其是内陆的国家不可能成为现代化制造业的加工出口基地的看法,为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动产业多样化、创造就业、减少贫困、实现包容可持续的工业化现代化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在一些转型经济体,2016年波兰副总理莫拉维茨基(现任总理)代表政府推出被称为“莫氏计划”的“波兰长期发展规划”,公开将新结构经济学称为其规划的理论基础。新结构经济学在波兰这一东欧剧变后转型最

① 林毅夫. 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

② 林毅夫, 王燕. 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③ 林毅夫, 塞勒斯汀·孟加. 战胜命运: 跨越贫困陷阱, 创造经济奇迹[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④ 林毅夫, 付才辉. 世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报告——新结构经济学之路[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成功的世界银行标准里的高收入国家的应用,显得不同寻常。<sup>①</sup> 这标志着新结构经济学开始在发展中经济体与转型经济体中逐步取代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2016年9月16日至17日,包括4位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在内的13位经济学家,于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议,讨论当今经济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在会议结束时与会者发布了他们达成的共识,即“斯德哥尔摩陈述”——被视为“华盛顿共识”关于政策制定原则的替代版,而林毅夫教授正是“斯德哥尔摩陈述”的起草人之一。

深受林毅夫教授“知成一体”学风的影响,近年来不少学界同仁也开始应用新结构经济学去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研究尽管不像林毅夫教授那样深入政策实践一线,但也体现出强烈的应用特征。应用研究与一般的基础理论研究有所不同,后者主要以揭示客观规律为主,而前者主要是确定后者的可能用途,以及寻找特定问题的解决途径。<sup>②</sup> 因此,应用研究的成果主要以应用工具和应用案例的研究成果为主。当然,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也并非泾渭分明。目前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研究也主要以这两类成果为主。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中也有不少关于经济发展的应用工具研究,例如“大推进”理论、营商环境、增长诊断、产品空间、随机试验、SCP模型、竞争力模型、价值链、波士顿矩阵、SWOT分析、战略地图、微笑曲线等。这些应用工具不但有理论基础,而且有很强的经验特征及可操作性,也因此为应用提供了便利。这些应用工具不但本身就蕴含和浓缩了诸多开创性的理论思想,而且直接面向政策实践。在管理学中,案例研究作为建构与验证理论的一种重要方法已被广泛接受和运用。事实上,在经济学中,案例研究也是发现与检验理论的重要途径,尽管相对于管理学中规范的案例研究而言,经济学的案例研究从形式上看有些天马行空。以大家耳熟能详的两个例子来说,在经济学入门教科书中的“吉芬商品”的例子<sup>③</sup>，“经济学中的

<sup>①</sup> Lin, J. Y., Nowak, A. Z.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for Less Advanced Countries*[M]. Poland: University of Warsaw Faculty of Management Press, 2017.

<sup>②</sup>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指标的术语解释,基础研究指为了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运动规律,获得新发现、新学说)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其成果以科学论文和科学著作为主要形式,用来反映知识的原始创新能力。应用研究指为获得新知识而进行的创造性研究,主要针对某一特定的目的或目标。应用研究是为了确定基础研究成果可能的用途,或是为达到预定的目标探索应采取的新方法(原理性)或新途径,其成果形式以科学论文、专著、原理性模型或发明专利为主,用来反映对基础研究成果应用途径的探索。试验发展指利用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际经验中所获得的现有知识,为产生新的产品、材料和装置,建立新的工艺、系统和服务,以及对已产生和建立的上述各项作实质性的改进而进行的系统性工作,其成果形式主要有专利、专有技术、具有新产品基本特征的产品原型或具有新装置基本特征的原始样机等。在社会科学领域,试验发展是指把通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获得的知识转变成可以实施的计划(包括为进行检验和评估实施示范项目)的过程。人文科学领域除了个别学科的特定领域如艺术学的乐器方向等外,一般来说没有对应的实验发展活动。主要反映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技术和产品的能力,是科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物化成果。

<sup>③</sup> 1845年,爱尔兰发生大饥荒。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吉芬研究了当时土豆价格与人们土豆消费量之间的关系,发现土豆价格提高,人们的需求量反而增加了。罗伯特·吉芬由此观察到必需品在一定条件下价格上升而需求不降反升的现象,得出必然存在一种需求量和价格同方向变化的商品的结论,后人将其称作“吉芬之谜”和“吉芬商品”。

灯塔”的例子<sup>①</sup>，都开创了重要的经济学理论。事实上，新结构经济学的雏形之作《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sup>②</sup>就是一部中国案例。因此，应用工具开发和案例研究构成了新结构经济学应用研究的主体，成为新结构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智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学科建设与智库建设则是新结构经济学“知成一体”的两翼。

近年来，除了基础理论研究，新结构经济学在应用型研究层面也得到广泛推进，相关议题涉及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工具及其应用案例。自 Lin 和 Monga(2011)首次开发出一款新结构经济学操作工具“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GIFF)以来<sup>③</sup>，后续的新结构经济学应用工具研究在此基础上得到不断推进，主要的进展方向可以概括为：GIFF 模型→五类产业模型<sup>④</sup>→新结构经济学转型升级模型<sup>⑤</sup>→具体的新结构经济学应用模型(例如，新结构经济学投资模型<sup>⑥</sup>、新结构经济学企业选址模型<sup>⑦</sup>、新结构经济学资源城市转型模型<sup>⑧</sup>、新结构经济学产业集群升级模型<sup>⑨</sup>等)。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研究覆盖了中国及其区域和世界各个地方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sup>⑩</sup>、少数民族地区与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与扶贫<sup>⑪</sup>、资源型地区的转型发展<sup>⑫</sup>、经济开发区的建设<sup>⑬</sup>、特定行业结构的转型升级<sup>⑭</sup>、

① 《经济学中的灯塔》是新制度经济学之父科斯的名著，科斯倡导的学风严厉地批评了不了解现实的黑板经济学。在该文中，科斯认为：“如果没有关于英国灯塔制度的知识，就很难确切理解穆勒、西奇威克和庇古的意思，因为虽然这些作者可能不熟悉英国灯塔制度如何运行的细节，毫无疑问，他们知道它的一般性质，而且在写作有关灯塔的内容时，他们心中肯定意识到这一点。有关英国灯塔制度的知识不仅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穆勒、西奇威克和庇古，而且可以为评价萨缪尔森有关灯塔的论述提供背景材料。”

② 林毅夫，蔡昉，李周.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 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

③ Lin, J. Y., and Monga, C. 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The role of state in the process of dynamic growth [J].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011, 29(3): 264—290.

④ 参见本书第一章。

⑤ 参见本书第二章。

⑥ 参见本书第五章。

⑦ 参见本书第三章。

⑧ 例如，胡春生和莫秀蓉(2015)构建了一个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新结构经济学分析框架，以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为分析起点，通过市场决定的比较优势，配合政府、市场，架构了一个系统的、操作性强的促进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 I-EIC 决策和行动框架。

⑨ 参见本书第六章。

⑩ 参见本书第四、五、六、七、八、十二章。

⑪ 例如，郑长德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讨论了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升级问题(郑长德，2013)。

⑫ 例如，卢心洁运用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GIFF)研究了山西省晋城市这一颇具代表性的资源型城市的案例，甄别出晋城市接续产业选择菜单以及对应地提出了当地政府发展接续产业选择的政策建议列表(卢心洁，2013)。

⑬ 例如，李力行和申广军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城市统计数据发现设立经济开发区可以有效地推动城市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变动，尤其是开发区所设置的目标行业的各项经济指标有显著提升。他们也进一步发现，当设置的目标行业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时，经济开发区的积极作用尤为明显。他们还通过对比设立于 2006 年的分别位于河南省新乡市的延津县和长垣县的河南延津小店工业园区和长垣起重工业园区两个省级经济开发区的发展案例，来证实比较优势在目标行业增长中的作用(李力行和申广军，2015)。

⑭ 例如，向云、祁春节和陆倩(2017)运用新结构经济学对长江流域种植业生产结构的区域差异及转型升级进行了研究，他们借助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和农业要素禀赋结构指数，利用 2004—2014 年的统计数据，发现长江流域种植业生产结构和种植业内部生产结构均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各省市种植业发展极不平衡，无论是种植业整体还是种植业内部都面临着生产结构调整优化和提高区域竞争力的双重压力，长江流域种植业发展已处于亟须转型升级的重要节点；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区域差异，是形成各省市种植业及其内部生产结构区域差异的主

企业的转型升级<sup>①</sup>、“一带一路”与国别研究<sup>②</sup>等现实经济发展面临的迫切问题。这些文章有的翔实,有的简略,有的是直接应用与拓展新结构经济学某些观点,有的则是争论甚至是质疑新结构经济学的某些观点。这些从不同角度与层面的应用模型开发和案例分析讨论对促进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大有裨益,能够积沙成塔,尽管有的文章的观点本身可能不一定正确,其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解和应用可能也存在一定的偏差。这些学界同仁对新结构经济学的关注与应用是对新结构经济学的鼓励和期许;他们的质疑、批评有些是源于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个新框架有待充实完善之处,有些是因为新结构经济学已发表的论述不够充分、清晰,有些则是仍以旧的视角来看新结构经济学所讨论的问题,有必要进一步交流、澄清。<sup>③</sup> 尽管如此,这些丰富多彩的应用研究不但有益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还可为智库研究提供借鉴。新结构经济学之所以得到广泛的应用,主要得益于其将结构引入经济学之后的理论原创性和系统性,使其更适合具有结构多样性的现实。然而,目前的应用进展相对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潜力而言还只是冰山一角,需要继续深入推进。本书作为新结构经济学案例研究选编第一辑,无法全部收录这些应用研究的大量成果<sup>④</sup>,只侧重选录了几篇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方法及其在中国和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宏观层面与微观企业层面的应用文章,以飨读者。

## 参 考 文 献

[1] 付才辉. 创建我国自主创新的新结构经济学学科: 综述、架构与展望[J]. 制度经济学研究, 2015, 4.

要原因。他们也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提出长江流域种植业生产结构转型升级的具体思路。采取类似的思路, 向云、祁春节和陆倩(2014)也利用2002—2012年的相关数据, 采用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模型和资源禀赋系数, 测算了主产区及湖北省16个市州柑橘的区域比较优势, 并分析了比较优势的影响因素。他们的结果表明: 与其他主产区相比, 湖北省具有柑橘生产的效率比较优势、规模比较优势和综合比较优势; 资源禀赋优势主要集中于鄂西地区的宜昌市和十堰市; 资源禀赋条件是影响湖北省柑橘区域比较优势的内在性因素, 比较优势还受到产业化经营、科技进步和市场环境等外生性因素的综合影响。向云和祁春节(2015)还利用2003—2013年新疆水果种植面积、产量、农业产值等相关数据, 测算了新疆14个地区水果生产的区域比较优势指数和资源禀赋系数, 据此分析了各地区主要水果生产的区域比较优势及其变动趋势, 并探讨了各品种水果在新疆不同地区种植的资源禀赋差异。他们的结果表明: 新疆水果生产的效率比较优势、规模比较优势和综合比较优势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和品种差异; 梨和葡萄的生产具有较强的区域比较优势, 且近年来这两种水果的比较优势呈现上升势头, 苹果和桃的生产缺乏区域比较优势; 东疆的吐鲁番地区和哈密地区具有生产葡萄和红枣的优势, 北疆的伊犁地区在梨和桃的生产上具有较强的资源禀赋优势, 南疆是新疆水果生产区域比较优势最明显的地区。向云、祁春节和陆倩等的这三篇文章很好地运用量化的方法研究了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种植业以及水果等经济作物的结构问题。

① 参见本书第十、十一章。

② 例如, 钟飞腾运用 GIFF 对“一带一路”沿线的重点国家和重点产业选择进行了案例分析(钟飞腾, 2015)。孙瑾和刘文革(2014)利用 GIFF 对世界 215 个国家进行了禀赋结构相似性分组, 重点讨论了德法日韩发达国家禀赋组、美国与北欧富裕国家禀赋组、亚洲劳动密集型国家禀赋组、亚洲落后国家禀赋组中的相应经济体的结构升级的“指南针”选择案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③ 这与对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层面的争鸣是一样的道理(林毅夫, 2013: 1098)。

④ 关于新结构经济学应用研究的一个详细综述可参考: 付才辉. 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研究进展: 工具与案例[R].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 2018.

[2] 付才辉. 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研究进展: 工具与案例[J]. 制度经济学研究, 2017, 4.

[3] 胡春生, 莫秀蓉.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新结构经济学分析框架[J]. 经济问题探索, 2015, 7.

[4] Lin, J. Y., and Monga, C. 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The role of state in the process of dynamic growth [J].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011, 29(3).

[5] Lin, J. Y., Nowak, A. Z.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for Less Advanced Countries* [M]. Poland: University of Warsaw Faculty of Management Press, 2017.

[6] 李力行, 申广军. 经济开发区、地区比较优势与产业结构调整[J]. 经济学(季刊), 2015, 3.

[7] 林毅夫, 蔡昉, 李周. 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 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4.

[8] 林毅夫, 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

[9] 林毅夫, 付才辉. 世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新结构经济学之路[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10] 林毅夫, 塞勒斯汀·孟加. 战胜命运: 跨越贫困陷阱, 创造经济奇迹[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11] 林毅夫, 王燕. 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12]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评论回应[J]. 经济学(季刊), 2013, 12(3).

[13] 卢心洁.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研究——以晋城市为例[D].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 2013.

[14] 孙瑾, 刘文革. 国家竞争优势产业甄别与升级——基于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方法[J]. 国际贸易, 2014, 4.

[15] 向云, 祁春节, 陆倩. 长江流域种植业生产结构的区域差异及转型升级[J]. 经济地理, 2017, 2.

[16] 向云, 祁春节, 陆倩. 湖北省柑橘生产的区域比较优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经济地理, 2014, 11.

[17] 向云, 祁春节. 新疆水果生产的区域比较优势分析[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5, 10.

[18] 郑长德.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研究[Z].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3, 12.

[19] 钟飞腾.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J]. 山东社会科学, 2015, 8.

## 方 法 篇



# 第一章 产业政策与我国经济的发展： 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林毅夫

虽然许多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但是尚未见不用产业政策便能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或能保持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业政策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既需要企业家的个人努力,也需要政府帮助企业解决企业家自身难以克服的外部性问题和相应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所能使用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不能为任何技术创新和任何产业升级都提供帮助,因此只能策略性地使用其有限资源,优先帮助能对经济持续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产业。这种有选择性地使用资源帮助某些产业的企业家克服外部性和协调问题的措施就是产业政策。由于没有产业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必然失败,许多实施了了的产业政策也未能成功,因此,作为经济学的家的责任不是因为怕产业政策失败而凡产业政策都一概反对,或是因为产业政策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无条件地支持一切产业政策,而是要研究清楚产业政策成功和失败的道理,以帮助政府在运用产业政策时,减少失败,提高成功的概率。本文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我国如何才能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以推动经济发展。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人均收入的不断增加,其前提则是越来越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现有产业中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二是通过产业升级,将现有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到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中。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这两者的实现需要“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共同作用。

“有效的市场”的重要性在于,引导企业家按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与国内国际市场的同类产品相比,成本才会最低,才会最有竞争力,企业才能获得最大的利润,整个经济才可以创造最大的剩余和资本积累,使得比较优势从劳动或自然资源密集逐渐向资本密集提升,为现有产业、技术升级到资本更为密集、附加价值更高的新产业、新技术提供物质基础。企业家会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前提,则是必须有一个能够很好地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如果有

这样的价格体系,企业为了自己的利润和竞争力,就会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合适的技术和产业,这种价格体系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才会存在。所以,按比较优势发展产业、选择技术的前提是,要有一个“有效的市场”。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为的政府”也不可或缺。首先,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资源必须随着要素积累、比较优势变化,不断从现有技术和产业配置到新的效率更高的技术和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的结构变迁过程。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如果没有其他必要的安排,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倘若失败,将承担所有成本,并让后来者知道螃蟹不可吃,不去犯同样的错误;倘若成功,后来者将会随之涌进,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不会有垄断利润。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其他必要的安排,对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而言,失败的成本和成功的收益是不对称的;而从社会的角度看,不管失败或成功都给后来者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因此,政府需要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一定的激励,企业家才会有积极性去冒这个风险。发达国家的专利制度发挥的就是这种功能。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一般是在国际的技术和产业链内部进行,多数情况下不能给予专利,但是,仍然需要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以必要的激励。当然,这种激励需要找到其他合适的替代方式。

其次,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成功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企业家个人的勇气、智慧和企业家才能。例如,要进入一个新的产业,所要求的从业人员的技能,和以往的产业不尽相同,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如果完全靠自己培训员工,后来的企业可以以稍高的工资聘走拥有新技术的员工,而使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蒙受损失。新产业所需的资本规模和风险也通常会比原有的产业大,需要有新的能够动员更多资本、有效分散风险的金融制度安排与其匹配,这也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随着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资本密集程度和规模经济水平的提高,市场的范围和交易的价值会不断扩大,交通、电力、港口等硬的基础设施和法律、法规等软的制度环境,也必须随之不断完善,这些完善显然超出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的能力之所及。随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技术和产业会越来越接近国际的前沿,新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的升级需要与这些新技术和新产业相关的基础科学的突破,基础科学的研发属于公共产品范畴,其发现不能申请专利,企业家便不会有积极性持续地从事这方面研究。凡此种种困难,均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来协调不同的企业加以克服,或是由政府自己直接提供相应的服务。只有这样,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能顺利进行。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动员和配置的资源有限,不可能满足各种可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所需的外部性补偿,达到所有相应条件的要求。因此,和企业一样,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也必须对可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经济和社会回报做出甄别,按“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精神,以产业政策集中有限资源,协助企业家从事那些回报最高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最好最快地发展,避免陷入“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同样,发达国家的政府也必须对其企业家所要从事的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和新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基础科研给予支持,由于发



达国家可以用来支持基础科研的经费并非无限,因此,也和发展中国家一样必须根据可能的回报来配置有限的科研资源,这种配置也就是一种产业政策。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用产业政策时经常失败,究其原因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容易出于赶超的目的,而去支持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果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只能靠政府永无止境的保护和补贴来生存。成功的产业政策必须是针对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所谓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指的是该产业的要素生产成本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有优势,但是由于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交易费用太高,使得总成本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竞争力的产业。政府若能针对这些产业中的先行企业给予外部性补偿并帮助完善软硬基础设施,则这样的产业政策能够使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变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如何在“有效的市场”环境中发挥“有为的政府”的作用,推动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以及将来从中高端向高端升级,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根据现有产业和国际前沿的差距,可将我国的产业分成五种不同类型,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各有差异。

**第一种是追赶型产业。**2014年我国人均GDP为7500美元,同年美国的人均GDP是57101美元,德国是44999美元,日本是38491美元,韩国是24329美元。这种人均GDP的差距反映的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距,代表我国现有产业的技术和附加值水平比发达国家同类产业的水平低,处于追赶阶段。我国的汽车、高端装备、高端材料即属于这种类型。

对于追赶型产业,我国各地政府和金融机构可以在资金融通和外汇获取上支持所在地的合适企业像吉利汽车、三一重工那样,到海外并购同类产业中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发达国家自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发展乏力,很多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经营不好,低价求售,出现了许多好的并购机会。

在没有合适的并购机会时,各地政府也可以提供方便,支持所在地的企业像华为、中兴那样,到海外设立研发中心,直接利用国外的高端人才来推动技术创新。

另外,各地政府也可以筛选我国每年从发达国家大量进口的高端制造业产品,根据其地区比较优势,创造这些产业所需的基础设施,改善营商环境,到海外招商引资,把那些高端制造业产品的生产企业吸引到国内来设厂生产。我国现在的GDP规模约占世界的14%,在新常态下,每年6.5%以上的增长意味着我国每年对世界贡献将近一个百分点的增长,现在世界每年的经济增长在三个百分点左右,也就是说,我国每年对世界市场容量扩张的贡献率达到30%。如果地方政府能够根据这些高端制造业的需要提供合适的基础设施、人才培养、营商和法制环境,国外许多高端生产企业会有很高的积极性到国内设厂生产,以满足我国不断扩大的需求,并以我国为基地生产供应世界各地市场之所需。江苏省太仓市的中德企业合作园区2012年被工信部授予“中德中小企业合作示范区”称号,截至2014年年底吸引了220家德国企业入园,投资总